

我对鲁迅「小说史学」
的理解二、鲁迅与《山海
经》三、鲁迅与《世说新语》
四、鲁迅论唐传奇五、鲁
迅论《三国演义》六、鲁
迅论《水浒传》七、鲁迅论
《聊斋志异》八、鲁迅与
「儒林外史」



我对鲁迅「小说史学」
的理解二、鲁迅与《山海
经》三、鲁迅与《世说新语》
四、鲁迅论唐传奇五、鲁
迅论《三国演义》六、鲁
迅论《水浒传》七、鲁迅论
《聊斋志异》八、鲁迅与
「儒林外史」

鲁迅 小说史学 初探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魯迅小說史學初探

鲁迅“小说史学”初探

孙昌熙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19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28-0618-9/I·18

定价 3.00 元

I210.97
272
2

6425167

鲁迅“小说史学”初探

孙昌熙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年·济南



2.761

目 录

一、我对“中国小说史学”的理解	1
(一) 鸟瞰《中国小说史略》	1
(二) 鲁迅为什么讲授中国小说史	2
(三) 从《中国小说史略》看鲁迅的“小说史学”	6
二、鲁迅与《山海经》	54
(一) 从爱好到研究	55
(二) 从中国神话之不发达说到《山海经》的性质	59
(三) 《山海经》神话传说与鲁迅创作	64
三、鲁迅与《世说新语》	79
(一) 一部中国早期特有的古典文言短篇志人小说 之代表作	79
(二) 鲁迅研究《世说新语》的硕果	90
(三) 鲁迅所受《世说新语》的影响	113
四、鲁迅论唐传奇	134
(一)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134
(二) 唐传奇实唐代特绝之作	143
五、鲁迅论《三国志演义》	154
(一) 鲁迅论《三国志演义》的思想倾向性	154
(二) 鲁迅论《三国志演义》史实与虚构的关系	158
(三) 鲁迅论《三国志演义》人物典型的艺术塑造	164
六、鲁迅论《水浒》	173

(一) 鲁迅论《水浒》好汉是“侠之流”	173
(二) 鲁迅论《水浒》好汉作为“侠之流”的特点	181
(三) 《水浒》为谁“写心”	186
七、鲁迅论《聊斋志异》	194
(一) 研究《聊斋志异》的过程	195
(二) 《聊斋志异》体现了继承与创新规律	202
(三) 深入开掘《聊斋志异》的艺术经验	212
(四) 学习发扬《聊斋志异》的艺术经验	235
八、鲁迅与《儒林外史》	238
(一) 一部讽刺名著的诞生	238
(二) 主旨之探索	241
(三) “藏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245
(四) 继往开来	253
(五) 社会主义社会的啄木鸟	260
后 记	262

一、我对“中国小说史学”的理解

（一）鸟瞰《中国小说史略》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特点，人们往往通过它的特点来认识它。鲁迅的名著之一《中国小说史略》具有独特的丰满的内涵：在时间上，它纵贯古今小说；在空间上，它横联世界小说。因此，我们要想具体把握它，必须从鲁迅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关系的角度，探索鲁迅不仅是位伟大的从事科学评价中国古典小说及其发展规律的史学家，而且是位敢于继承和创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特别是以小说创作为代表的主将和旗手。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神话以来汹涌奔流的小说长河万古常新。

必须指出：新文化并非自天而降，必有所继承。鲁迅客观地、科学地整理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开首语），并加品评，号召大家（自己首先带头）有选择地改造它，且吸吮其乳汁，从而创作新小说。而鲁迅的小说，也因此成为历久不凋的典范，真是“问渠那得青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当然鲁迅小说创作之根是深埋在时代活土里的——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但没有各个时代作品的积累与内在流动，即不断继承、借鉴而创新，便形成不了小说史。所以鲁迅很注意新文化承传的这支接力棒，或熊熊火炬，小说史才得以源泉滚滚，不舍昼夜。他还充分认识到，文学革命并不割断历史，是促其新生，或对旧作品的新评价。

如果说：源头活水是承传与革新，是中国小说发达史的基因、主干，是纵贯古今的流脉；那么，从外国的作品、理论，经过选择而引进，加以改造和消化，则成为滋养本体的养料，这便是横联世界。所以鲁迅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小说史的过程中，总是作世界性的宏观考察，他从不忽视中外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他看到中国小说的发展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事，但又与世界相联系，始终在与世界相联系中前进，从而形成了东方体系。《中国小说史略》（后简称《史略》）的伟大，及其世界文学性的内涵，正在于此。

在研究工作中，只有独具慧眼，才有独创；鲁迅之所以能写出体大思精，富有传点的小说史来，绝非偶然。因为他既是社会科学家又是革命作家，又是学者和不断接受先进学说的思想家。现代文学中的大文豪都是作家而兼学者，是文坛、讲堂的主传者。所以不论是创作上还是学术上，都能融古今中外于一炉，而又独传富有民族特征的新产品（创作或学术专著）。鲁迅则是新文坛的主将、旗手。《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实绩”，《史略》是“五四”以来研究古典小说发展的第一座丰碑，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名著，而且它的体精论宏，富有指导性，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灯火。

而他对古典小说的评价之公允深切，将永久地指导着当时和后来的广大读者。

（二）鲁迅为什么讲授中国小说史

关于这个问题，鲁迅作过两次科学性的回答：第一次是在1923年10月7日，为《史略》排印本所写《序言》中指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第二次是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于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后简称《变迁》）的

开端语中说：中国小说遗产里堆积着许许多多“倒行和杂乱的作品”，因而要整理出一条线索来。鲁迅的回答是真实的，愿望是伟大的。这是一个空前宏伟的工程，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但为了增加中华民族的光辉，他自信地把这艰辛的任务担在自己的肩上。

《史略》是开山之作。如无五丁之力，是很难完成任务的。鲁迅在编写和讲授本课程之前，就有深厚的素养，也可以说有足够的准备的。

鲁迅在1920年到北京大学教小说史课，曾有一个小插曲：北京大学原请周作人开小说史，他有自知之明，乃推荐鲁迅去。因知鲁迅自小嗜读旧小说，坚持不懈，积累甚丰。此外，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也读了些世界进步小说（包括日本作品），还注意外国人的作品评论（其实一些好的祖国的书评遗产，如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的评点就颇影响了鲁迅），和一些文学史理论著作，如勃兰兑斯的著作就颇影响了但，这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反映了出来。更学习和运用当时的新学科——比较文学。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也对他产生过影响。……这些都和鲁迅后来开小说史课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是位伟大的爱国革命家，当他阅读外国进步小说并加以研究消化吸收时，他不能不想到祖国古典小说，且进行思考：由于儒家向来不重视小说，它长期被排斥在文学领域之外，因而从古神话开始，就大量散失。欲研究古典小说，就不得不先做大量的钩沉工作。而这工作是不易进行的，不仅需要博览群书（主要是工具书），在文学方面也要有真知灼见，尤其要有新的学识，而鲁迅恰恰具备了这些方面的全面、精湛的修养，并胸有此志。于是，他在1909年回国后，便按部就班，先从搜集整理材料开始，到1912年辑成《古小说钩沉》书稿。

同年为本稿作序，发表于《越社丛刊》第一集。序有独到之处三点：第一，打破对小说的传统旧观念。第二，指出小说产生的原因。第三，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鲁迅心目中似乎已有一部中国小说史了，而《史略》乃其实践之成果。因此完全可以说，《古小说钩沉》已用新观点、新方法开辟了五四时期古典小说整理研究之先河。

自然，鲁迅在讲授小说史之前，也见过中外少数文学史家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讲到小说，但却都是“真伪不辨，论述简陋”（《史略·序言》），且均无“史”的概念。独鲁迅的《史略》是中国第一部小说史，而且建立了“中国小说史学”。这就是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重大目的之一。

鲁迅开创中国小说史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古为今用。像他创作现代小说一样，总是坚持密切联系实际或从现实斗争出发的原则。他著述《史略》的主要动机，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结合，或者说是在小说领域里向儒家（特别是道学家）思想进攻的一个偏师。

儒家思想从宋代理学（甚至更远一些）开始就渗入到一些小说中去，并且向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说进攻。因此，鲁迅在《史略》中，在小说前进路上，理出两条——真、善、美与假、恶、丑——路线的斗争。鲁迅《史略》建立这种新的结构形式，鲜明地揭发出中国古典小说领域的反动力量，同时更显示出了新的民主力量之不可战胜性；就是这个力量推动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而且奔流向前，即从神话传说开始，中国小说便有一个战斗传统。同时也给五四新文学家和读者们敲起警钟：中国古典小说并不全是优秀的像《儒林外史》那样可以阅读受益，也有好多宣传封建思想的像《儿女英雄传》之类的

书。鲁迅更担负起为古人翻案（如为曹操）为古典小说昭雪（如把被道学家看作诲淫之书的《红楼梦》向广大读者评荐）的担子，把古典小说抬进文苑。

还应指出：鲁迅虽重视中国小说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来著《史略》，并且自己也参加批判道学家的斗争，但并不排斥这个战线之外诸作（如“狭邪”“侠义”等）。他的“史”的重要观念之一，就是重视从文艺（小说）发生学到生态平衡的这个规律，坚持从小说看社会识人生的理论。因而他从许多角度，全面考察古典小说，吸取整理论述，使他的《史略》内容既丰富又科学化。于是这部专著真正体现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全貌，让读者井然有序地窥见了政治、社会史，游泳在漫长的、坎坷的不幸人生滚滚长河，追逐思潮流转，……更从侧面理解了中华民族精神。总之，鲁迅希望读者多多睁开眼睛，看看五花八门的小说世界。

然而鲁迅并非主张在《史略》里良莠不分，兼收并蓄，他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目的。有如作家进行创作一样，他可以自由地向生活里选取题材，但却根据自己的创作动机。鲁迅创作的《高老夫子》和《肥皂》，主角是流氓赌棍和伪善者，然而在现代小说史上却是名著。因此，在小说史里，实践了文艺生态平衡论，正是《史略》特色之一。鲁迅著作《史略》目的之一，就是以科学的标准对古典小说重新评价，以便在小说史上重排座次（包括被告席位）。这就有理由把古典小说抬进文苑，把小说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并把从神话以来到“五四”开始的新小说，看作一个整体。鲁迅讲授与编著《史略》的目的之一，是为新小说创作寻根溯源。新小说创作总得有个源头，它只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抽刀断水水更流”，它要沿着战斗的传统奔流，一部小说史主要就是总结的继承与

革新的作品变迁过程。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看》中指出：所继承的是能照耀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而没有冲破旧思想，缺乏新精神之作，便不能继承。新文化“大抵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中国古典小说，对于新小说创作有影响，但继承的是什么呢？原来它有个遗传的基因，这就是能发光的国民精神和长期积淀下来的可贵的艺术经验。这是《史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鲁迅著《史略》的动机之一。

（三）从《中国小说史略》看鲁迅的“小说史学”

鲁迅所研究的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从“史”的角度，以新的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的许多问题，如发展规律、评价标准等等内涵极为丰富，而又独成体系，因而鲁迅不仅著述了一部科学著作《史略》，而且建立起一门新的学科——“中国小说史学”。

1. 科学的历史分期原则

小说史主要是运用发展规律和评价标准科学地对历代作家作品作“史”的合理安排和精确的论述。小说史是历史，但它是小说的发展史。从宏观考察：作家的思想感情固然受自然、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思潮等的外部诸因素决定性的影响，去创作他的作品；但由于这些外部条件的复杂性，特别由于作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作品就不是由一个模子出来的铸件，而是成为各种品类和流派，并且存在着不断继承与革新的成长过程，使小说本身有相对独立性，各派汇流发展成为长河。这“史”虽与外部客观环境有著密切联系，是“史”的诞生、成长的黄土地，也是某一流派的墓场，而又孕育出了新品种，这就明显地显示了它在相对独立发展。它与外部环境的变迁，决不同步。它有较长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普遍性。越是优秀作品，

时与空对它几乎无能为力。有些流派可延续得比较长久，因此对中国小说史的分期，鲁迅于1930年11月25日夜，在给《史略》所作《题记》中，便对“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的主张，有所揶揄。

当然，鲁迅并不忽视朝代与小说之关系，唐代的“传奇”小说至宋衰亡，在《史略》里就大书特书。但鲁迅却更尊重小说自身的发展而划分史的阶段。有时甚至往往以作品为篇题。如第七篇：《〈世说新语〉及其前后》，就概括六朝一个大时代。由于一种小说类型的变迁，一个朝代往往概括不了，因为它有个成长期，它的发展往往经历两朝以上者甚多，所以鲁迅就以时代为经，以品类为纬，作经纬交叉之篇题，如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等。因而，这种以时代为经，作品类型为纬的划分法，固然重视时代，而不以朝代划分，但却更尊重小说自身的自然的发展阶段，从而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小說发展分期的完整框架或者把它叫做“坐标”。由于这一划分原则是科学的，便为此后有的小说史家所继承与发展。

这个史的框架或坐标其实也是个中国小说发展的总规律。只有依靠它，鲁迅才能把他考察、研究中国小说所寻找出来的许多其他类型的有机联系的规律充实和结构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的科学体系。

2. 古典小说的发展规律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作品的延续，便不会有小说史。而小说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小说有一个产生它、影响它发展变化的变动不居的客观环境，这在前因我们已提出来了。这个环境激动小说作家的思想感情（有的顺应，有的逆反），便发而为作品。所谓“缘事而发”。鲁迅在《史略》里

指出：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这些人类最早的小说创作，鲜明地反映出文学与大自然的关系。鲁迅在《史略》第二篇，即指出神话之产生来自对于大自然运动之不理解，然而具有征服自然的战斗性。还指出：六朝时代多产生志怪小说，则主要受佛、道两教之影响（《史略》第5、6两篇）。而清朝的武侠公案小说，则与当时的特殊的政治情势所影响到社会上产生的一种“乐为臣仆”的心理有密切关系（《史略》第27篇）。可见这些客观环境是文艺（小说）产生的唯一土壤。鲁迅后来（1927年）总结说：“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在《史略》里正是从发掘到这个文艺与现实的根本规律，进而唯物地阐释：为什么在特定时代环境里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小说？在这里鲁迅已掌握了“文艺生态学”。

作品诞生以后，要接受读者的筛选（由于有些读者的欣赏水平和低级趣味，有些坏作品可能不但保留下来或竟继续大量生产）。那些优秀之作，本身既有较久的艺术生命力，同时因通过继承与革新的规律延续其生命。这是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规律，但总受到那个文艺与现实规律的支配：虽然在继承与革新的过程中，会起很大变化，从总体上看却始终受影响。如《水浒传》之后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而后又有武侠公案小说。这固然与作家的立场思想、创作个性有关，也有继承与革新，而主要则是受时代的政治风云、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

继承与革新这一小说发展规律却万万不能忽视，其内涵是异常丰富的。鲁迅通过对历代小说内容的研究，用比较与联系的方法，挖掘出了士大夫创作本身所呈现出来的这一规律的复杂性，如清《聊斋志异》之与唐传奇的继承与革新之关系，且

形成一个流派，特名之为“拟古派”。同时，鲁迅又经过小说内容性质的研究，运用比较的方法，发现了不同性质的两种小说：士大夫创作和民间创作。这两类性质对立的小说既是矛盾的却又相互影响，于是鲁迅从中发现了一个在小说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规律，说明了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赖以不堕，中国小说因以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和世界上的一样，有两种小说：上层的与民间的。上层的士大夫文学单靠自身的继承与革新是困难的，特别是革新要有外来的养料，不然终会枯竭。鲁迅总结中外文学史上的经验，他发现一个重要规律：中国文学（包括古典小说）由于不断吸收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滋养品而获得生机，得以欣欣向荣，川流不息。这是鲁迅研究中外文学史，特别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的一个重大发现。中国民间文学不但刚健清新，有力，而且是民族文学特征的基础。鲁迅自小热爱民间文学艺术，并且有的成为他的创作素材之一，如《社戏》、《女吊》等。还由此奠定了他的小说富有民族风格（见《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基于对民间文学决定性地使士大夫文学（小说）起死回生的作用的这一科学认识，并作为指导思想，于是他科学地整理了中国小说史上这一复杂现象和丰富的资料，而加以论述和评价，便成为《史略》的也是代表中国小说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史略》中，民间小说（话本）与文人小说发生密切关系而产生长篇小说的现象，占有极大分量。鲁迅在《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把这一现象说得很清楚。

“《大宋宣和遗事》……就是《水浒》的先声”。并总结说：“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

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这固然是指的长篇巨著，而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第二高峰的《聊斋志异》也由于大量吸收了“四方同仁又以邮筒相寄”之民间故事传说，而盛行不衰。作者蒲松龄因而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可见这规律的内涵极为丰富。

但鲁迅把它作为规律而正式提了出来，则是1934年的事。他说民间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不过辩证论者的鲁迅早年在编著《史略》时，却往往遇到一些复杂的情况：文人摄取民间话本改造充实出现了长篇白话小说，这是宋以来短篇白话小说的大发展；但同时在整理比较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文人的这些新著有问题，特别在人物塑造方面。这些差异，鲁迅在《史略》或《变迁》中都已指出。而把这一现象上升为理论、为规律，则是在晚年的致友人信中所指出的：文人对民间文学的这些“摄取”并非兼容并包，而是自古以来就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而有所“择取”和改造，因而出现差异。这是鲁迅成为马列主义战士以后的科学结论。如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地绞死它。”（《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5页）

而这个现象在中国小说史上也常出现，鲁迅都已作了或多或少的评析，如宋江、孔明、唐僧等性格都有程度不同的被改造。宋江后而专谈，这里谈谈唐僧。“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虽然是《西游记》的先声，但又颇不同：例如‘盗人参果’一事，在《西游记》上是孙悟空要盗，而唐僧不许；在

“《取经诗话》里是仙桃，孙悟空不盗，而唐僧使命去盗。——这与其说是时代，倒不如说是作者思想之不同处。因为《西游记》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经诗话》之作者是市人。……”

（《变迁》第四讲）这就是士大夫改造了民间文学。

尽管如此，但这个规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规律。民间文学不仅向士大夫文学不断输入新血液，使之永不枯竭，而且因以保持和发展了民族特征。士大夫的改造民间文学是必然的，否则就非士大夫文学了。不过大醇而小疵。士大夫对外来文学也同样加以选择改造，为本民族的文艺发达是有所贡献的。这应当是全世界各民族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普遍规律。至于如何正确运用这规律，鲁迅便提出了“拿来主义”。

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自己的文化，屹立于世界并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那就必须引进有益于己的外来文化，并以“拿来主义”把关——把民族化之关！鲁迅留学日本时，就考察了外来影响的巨大作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高度评价了摩罗诗人突出的政治倾向、战斗精神的创作之“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普希金），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如力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其他宗徒，不胜俱道。”他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主要目的：“异域文书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籍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沚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序言》）

由于鲁迅深刻研究并通过实践，理解到中外文学之关系，特别是引进外国新作品，给本民族文化注入新血液，他便发现了在中国小说领域里存在着的一个东方体系：印度——中国——日本。当时鲁迅虽然掌握资料不多，在《史略》里却能够